

# 臺灣高山型國家公園登山運動 的空間想像

陳其澎<sup>1</sup>

中原大學

## 摘要

在世界地理景觀中，山岳的存在超過萬年以上，而有關山岳景觀的空間論述都只是近代之事。從三百年以前，歐洲的壯遊（The Grand Tour）才開始。而三百年來隨著現代性的進程讓山岳這項古老的景觀，登山這項傳統的活動，在不同的時代中，與不同的國家顯現出不同的象徵與想像。本研究注意到臺灣布農族原住民與山岳景觀之間的互動，所展現出來的歷史、社會、以及文化的意義，但是長期以來，受到不同政權錯誤的歷史解讀。本文亦指出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其殖民力量所進行「框架」（enframing）布農族原住民與山岳景觀之企圖。

本研究以臺灣高山型國家公園作為研究對象，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探討近代的登山運動，透過來自登山客本身的口述、日記、自傳、文獻的資料作為研究基礎，透過從歷史文化的不同視野來洞悉臺灣高山登山路徑的空間想像。臺灣登山活動就像是一種表現社會如何探索與景觀互動的力量，特別是臺灣這種曾經歷經不同政權與文化殖民的國家。

關鍵詞：流動、國家公園、登山、健行

## 壹、緒論

法國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曾有此認知：「我總認為我所不在場的地方比較好，因為運動就形成我不停與內心交談的問題」<sup>2</sup>（Baudelaire, 1998: 146）。不僅是波特萊爾，

---

<sup>1</sup> 作者為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sup>2</sup> *Il me semble que je serais toujours bien la ou je ne suis pas, et cette question de demenagement en est une que je discute sans cesse avce mo name.* 原文出自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第48章〈人世間之外〉（N'importe ou hors du monde; 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

R. Solnit的*Wanderlust*一書中列舉了梭羅、齊克果、華滋華斯、班雅明等人都是藉由運動(她專指旅行中的步行)中得到種種知識啟發。(Solnit 2000) G. Simmel (1993) 在〈阿爾卑斯山之旅〉(the Alps)一文中:「登山是逃離社會與城市,逃離現代存在的矛盾,逃離客觀與主觀文化的矛盾」中的「逃離」的涵義值得探討。阿爾卑斯山對Simmel而言,是遠離市塵毫無一絲生命的脈動,但是遠離就是一種超越(transcendent),這種不受限於世俗生命的遠離,事實上才是阿爾卑斯山印象的最後秘密(Simmel, 1993: 181)。Simmel 1903年的重要著作*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是由下一段引言做論述的開端:

現代生活的最深沉的問題起源於現代人在面對巨大社會壓力、歷史遺產、外在文化、生活技能時為保持自治力與個人性存在的要求,而這些也正是原始人對抗自然為求生存種種付出的現代翻版(引自Lewis, 2000: 66)。

這段引言中有兩個重點:第一, Simmel警告大眾消費社會對個人的危害,虛構與刻意需求的創造,已經異化或距離化個人實際的生存力。第二,現代對個人身體性與實體經驗的脫離。在現代生活是輕鬆的,但由於無須付出身體上的努力,也讓身體降低或喪失了自我推動力、決定力、甚至是自由,生活變成自動化再也無須身體的直接行動。(p.67)

幾年之後,1910年Simmel的新作(*The Adventure*)中開始提到登山:

作為可以享受片刻的介質(按:登山),這是來自於人們能量的發揮,雖然挑戰危險,但欣賞全景的情感。真的,我會將這當成生命中所能提供的最高享受。對於現代存在的缺乏安定、缺乏確定、缺乏自由的矛盾,讓我們更激情地渴求高山。(引自Lewis, 2000: 68)

對他而言在荒野中探險,身體才可以新生,因為流動的身體會自找出路:存在於自然,了解自然,自然地保守自己。冒險讓身體拋開懶散(blasé)的態度,流動的肢體讓身體得以重生。Simmel認定我們就是地球上的冒險家,在險境中透過身體對環境的掌控而了解自我(Urry, 2006: 25)。以下就順著Simmel的說法,從現代社會流動到高山地區,從現代都會的身體流動到高山上登山的身體展開討論。

## 貳、身體之旅

John Urry (2000) 討論21世紀的流動性討論中提出「身體之旅」(corporeal travel); 想像之旅(imagined travel); 虛擬之旅(virtual travel)等。其中身體之旅他從華滋華斯(Wordsworth)的英格蘭湖區(Lake Districts)之旅,到波特萊爾巴黎的漫遊者(flâneur)之旅, de Certeau的城市觀察,甚至談到羅蘭巴特對西班牙佛朗哥政權頒行《藍色指南》(*Guide Bleu*)抹殺回教文明旅程的批評。然而有關身體之旅描述的最為透徹的文章當屬R. Solnit (2000)的《漫遊之旅》(*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書中闡述從步行歷史中談論亞理斯多德、盧梭、梭羅、華滋華斯、波特萊爾、齊克果、班雅明等人的步行經驗,

並討論希臘柱廊 ( stoa )、英國湖區、巴黎與倫敦的街頭或購物廊 ( arcade )、山岳、乃至於拉斯維加斯的大街等城鄉空間，表徵出休閒、政治、美學、社會的意義，步行實際上只是銜接兩地最自然的交通工具，但它卻更能牽引出是一種探索、一種儀式、一種沉思、甚至是一種哲學。在當今加速的時空中，標榜慢工出細活的步行挑明著是唯一能跳脫現今時空限制，正代表著一種新的流動思維方式，其中登山攀岩更是被視為一種垂直步行的藝術( Solnit, 2000: 133-134 )。N. Lewis ( 2000: 69-71 ) 對此點有更深入的剖析，登山過程中身體呈現出三種向度：水平 ( 前進／後退 )；方向 ( 左／右 )；垂直 ( 上／下 )，如此一來身體變成是空間導向。N. Lewis曾經以身體經驗角度，對冒險山友與都會人士做了比較，說明山友身體是有機的、自立、觸覺體驗，植生在土地之上的身體表徵，而一般都會人士的身體則是無機的，被動、視覺取向，失根的身體表徵。( Lewis, 2000: 59 )

可是面對美景，山嶺又是最危險的地方，在山巔之前，人總是脆弱的，一片墜落的岩石可能瞬時讓人殞命。在群山峻嶺之中漫步，可以享受著空間、時間以及感官的特質，登山客樂於挑戰不確定、不熟悉以及不可測的狀況。( Edensor, 2000 ) 在班雅明 ( Benjamin ) 的眼中，這種狀況就是一種氛圍 ( aura ) 一種特殊的空間質感。因此走在群山中，就是要呼吸這種氛圍 ( van Reijen, 2001: 36 )：

甚麼是實際的氛圍？就是一種特殊的時空質感：在不管它是多近的距離，所感受到的獨特現象。當你在一個夏天午後躺著休息，順著眼睛眺望天邊的遠山，或凝視眼前樹梢的樹影。直到你也化成眼前景物的一部分時，當下，你呼吸到山景、樹影的氛圍。

對於班雅明這種氛圍是可以凝視，也可以觸摸，或許就是登山客在山嶺之中感受最深切的。對於某些人而言現代性是高度可預測性以及高度安全與可靠，但對於現代的登山客而言，登山卻面臨著在懷抱不確定與不安全，也代表放棄地位與名聲，期許自我設身在一處荒原之中。氛圍或許就是自我挑戰，充分的反映對現代性的反制與挑戰 ( Kiewa, 2002 ) 尋求在登頂之時，享受最高處的孤獨感，尋求一些難以捉摸的感覺，並得到孤獨的感受。( Myers, 2002 ) 因此透過對登山者所感受到的氛圍，更可以了解班雅明對現代性的詮釋。在羅蘭·巴特的《藍色指南》指出歐洲遊覽地點所指涉或是高山景觀，這是一種源於歐洲布爾喬維亞階級的喜好。牽涉到起源於基督教道德觀對自然與純淨主義的崇拜 ( 透過呼吸潔淨空氣、凝視山巔、攀登峻嶺等身體動作而生成再生感覺 )，只有山嶽、峽谷、山徑、湍流等才會列為旅行路線的選點。平原、台地除非是豐腴沃土是不可能膺選上的 ( Barthes, 2000: 74 )。

高山是臺灣的象徵，國家公園的旅遊，其間高度，緯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林相變化，富饒美麗的動、植物資源、歷史遺蹟吸引人的特色，故此應建立起臺灣高山之登山美學，融入視、嗅、聽、味、觸五種感官，更加鼓勵高山自然資源立體化、深度化的應用。從至高點看到一山又一山的連綿蒼柏，環視四方，但登山精神並不是只有征服，而是對山嶽的無限景仰，如原住民族群的山嶽凝視。臺灣有三個高山型國家公園，國家公園為一個國家的代表風景，而臺灣何其幸運擁有如此的奇景美色，畫家也透過畫中表達了強調高山的高聳氣勢所繪製的繪畫。國家公園中設置了許多不同等級與性質之步道，不但可使一般民眾有機會一窺山林風貌，更可於其中體驗自然、觀察生態、強健身心。三個高山型國家公園中，如玉山國家公園的步道依使用性質不同，分為一般道路、林道、步道三種，而步道又因行走困難度區分，高、

中與一般健行步道等三等級之登山步道，且各登山步道也因其位置不同，而各有特色，如八通關古道之歷史文化特色，麟趾山登山步道沿途的優美景色，塔塔加登山步道於轉折處總賦予人驚豔的美景等等。

臺灣登山活動應該是一種表現社會如何探索與景觀互動的力量，所展現出來的歷史、社會、以及文化的力量。特別是臺灣這種曾經歷經不同政權與文化殖民的國家。臺灣的人民與山岳景觀之間存在著一種熟稔的認同關係，因此臺灣在歷史上的登山活動也充分顯現出是文化表現的媒介，而其象徵的意義是表現出存在臺灣社會與文化中的想像。職是之故，本研究就是企圖有別於傳統研究流動的取向，企盼將本研究的目的導向於研究文化景觀的意義，利用臺灣高山型國家公園的古道山徑系統所表徵的山岳象徵與空間想像來討論。從各種研究中可以發現有關山岳的想像、意象，事實上是與我們先入為主的企圖有關。在本研究，除了討論中外文獻中有關的論述，並以個人長期以來投注於臺灣高山型國家公園的觀察為案例，企圖探討登山歷史過程中有關發現、冒險、登山以及觀光有關的課題，作為反映臺灣山岳象徵與空間想像的依據。事實上，這也是本研究與其他研究最大的差異，或許就是本研究重要的地方。而本文研究之不同處在於：

1. 不同世代（日治、戒嚴、解嚴、政權轉換）的對於臺灣高山的空間想像與象徵意義。
2. 從原住民的角度思考，如何將原住民文化中的遷移路徑與國家公園登山路線相結合的重新思維。
3. 剖析臺灣「萬里步道推動計畫」中原住民在高山旅遊中可扮演之角色。
4. 山岳地景的再現：包括古道導覽內容、路線再規劃、景點之再檢討，以符合山岳景觀象徵與想像的真實性呈現。

國家公園內的山岳景觀是登山客的最愛，因為包含了山峰、步道、森林、瀑布等自然景觀外，最令登山客嘆服的是登頂之後，環山群抱俯瞰山岳連峰的泛視（panorama）的景觀效果，都是眾人追求的境界。而在群山之中，步道、小徑等絡線可以模式化實質的地理，讓人在地景中得到認同、再認同、發現得到知識，最後增進智慧。

## 參、歐陸的知識之旅

### 一、Monarch-of-all-I-survey的帝國之眼

十九世紀歐洲中上流社會開始展開所謂的浪漫「知識之旅」，這是一種壯遊（Grand Tour），就是貴族們攜帶大量隨從遠赴歐洲大陸：地中海沿岸、義大利、希臘等地旅行，名為吸取知識，事實上是種身分地位的標榜。而這種旅行之前身，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但是以十九世紀初英國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的英格蘭湖區（Lake Districts）之旅最為著名，他在旅行之旅程中以詩文描寫山水景致。不僅深深感動了英國民眾，提昇了英國湖區的國際知名度，更因而使湖區山光水色變成代表英國的驕傲，更鼓勵了大多數的英國年青人勇敢地邁向旅程，不但挑戰自我也可以增加見聞（Urry, 1995: 193-204; Solnit, 2000: 104-117）。

然而這種挑戰自我與增加見聞，在Mary Louis Pratt其探討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旅行文學的論述《帝國之眼》( *Imperial Eyes* ) 中，卻是具有西方優越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monarch-of-all-I-survey ) 的觀察，是旅行者站在視野遼闊的海岬上、山頂上，把眼前的景物映入眼簾的描述 ( Pratt, 1992: 204-205 )。若照Pratt的說法，這種描述正是所謂的「發現修辭」( discovery rhetoric )，Pratt認為這些旅行的描述雖然都呈現對「異己」的包容與關懷，僅管如此，Pratt對此卻是犀利的批判他們皆含有「帝國主義」的意識，是以反征服 ( anti-conquest ) 之名來遂行其文化征服之實：「反征服是歐洲布爾喬維亞 ( bourgeois ) 階級的一種策略，以保證當他們無知時能夠獲得確保，並同時能夠繼續歐洲的霸權」( Pratt, 1992: 7 )。

Wolschke-Bulmahn ( 1992 ) 指出起源於十九世紀的德國青年運動「流鳥」運動 ( Wandervogel or Migrating birds )，是德國布爾喬維亞階級的年輕人興起的一種運動，代表著對於父母、學校、教會等所支配傳統社會的反制。為了逃離傳統的布爾喬維亞社會，他們結伴而行主動地親近自然景觀。他們反對觀光式旅行，不喜歡受限官式的登山路線，登山健行以便於自然景觀中探險則是其中最主要的活動，而登山健行也代表著從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脫逃的意義。許多的登山者紀錄了其旅途的種種景緻，越來越多的旅遊經驗傳頌，竟也造就了一種理想的自然景觀，如傳送最為廣泛的映像代表是：「廢棄的廢墟；不規則的石塊；阡陌縱橫的田野；變化多端的田地與森林；掩燭的溪流；可愛的村莊；其茅草屋頂與風土建築。」( Wolschke-Bulmahn, 1992: 36-37 ) 或是「我登上高塔欣賞壯麗景觀。地平線上黑色的森林對映著青天，夕陽金黃色光芒鑲嵌著白雲的邊緣。深谷中隱藏著安逸的村莊，好一片平和的景象」( pp.39-40 )，類似的畫面其實就一直在歌德( Goethe )、Koch、von Schwind 等人德國傳統的繪畫與文學中傳送著。德國文豪歌德在1779年的阿爾卑斯山旅行，曾經對山嶺如此讚嘆：「言語是無法描述山岳景觀的高貴與美麗」。德國十九世紀以來的流鳥運動，所宣傳的登山健行運動，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表達：在山徑上，在岩盤上，山友透過了身體與自然環境。「流鳥」( Wandervogel ) 運動理想上應該是為反抗德國獨裁主義而生，但他們卻無能力亦無洞察力去反對德國移向法西斯主義。( Solnit, 2000: 158 ) 景觀的直接接觸，因為在德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這種身體運動，代表著德國子民身體與德國土地的互動，描繪出一種建構國家體制的願景。如一位「流鳥」運動隊員發出這樣的讚嘆：

透過登山與觀察，德國第一次變成我們的……我們會認識並相信每一朵花、每一棵樹、每一條河川。我們必須知道也必須學習與收集人民的傳說與詩歌、習慣。透過專心，我們可以守護它們 ( Moranda<sup>3</sup>, 2000: 11 )。

納粹德國在1930年占據波蘭時，強制驅離波蘭人，並將原有波蘭的原野景觀徹底改造成德國人理想中的歌德年代 ( Goethe-age ) 的景觀，是指那些由德國詩人 ( 包括歌德 ) 以及繪畫中所呈現理想田園景觀，而這也正是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景觀，再將德國移民移植在這個新世界營生，這是以政治力介入，完全可以不考慮被殖民者的感受，將所謂理想景觀強加在他人國土之上。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計劃雖然是納粹黑衫隊領袖希姆萊 ( H.

<sup>3</sup> <http://www.nationalismproject.org/articles/Moranda/moranda.html>

Himmler) 領導的團隊負責，團隊成員大部分曾經參與過德國布爾喬維亞階級青年運動，而計劃的主要執行者 Meyer 更是德國「流鳥」運動的原來成員 ( Wolschke-Bulmann, 1992: 41-42 )。在對登山歷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某些國家，如德國就利用其 Baedeker Guide 中灌輸了國家沙文主義，而當納粹掌權之後，德國政府透過這些登山手冊，把國家主義的觀念灌輸入觀光的潛力當中，而當二戰當中，德國政府更是把其新併吞的疆域，編入其新版的旅遊指南之中 ( Koshar, 1998 )。

## 二、臺灣山岳凝視：日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察

從清代的臺灣八景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八景是有關臺灣自然景觀的「發現修辭」，若對照以上的說明，事實上也像是透過帝國之眼複製著心目中的理想景觀。清代高拱乾《臺灣府志》首先出現臺灣八景，而所謂臺灣八景為：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斐亭聽濤、澄台觀海。清代八景突顯的是清代官員眼中的景緻，是屬於「泛視系統」帝國之眼的監看。到了日治時期的新臺灣八景，不同於清代出於官員之手，是由昭和2年( 1927 )臺灣日日新報舉辦《臺灣新八景》票選活動中產生：神域 台北神社、靈峰 新高山、台中八仙山、高雄鵝鸞鼻、花蓮太魯閣、台北淡水、高雄壽山、台南阿里山、台中日月潭、基隆旭岡 ( 宋南萱, 2000 : 48 )。有趣的是在原本候選名單中，台北神社只居於第八位，而新高山更在二十名之外，而最後此兩者被置於臺灣八景之別格地位，以彰顯其特殊地位，其實無非是其政治操作。清代以「海」為主，清代臺灣八景突顯當時政治中心 安平一帶的景緻，以及由大陸而來的文化來源。而日治時期臺灣八景的象徵意義以「山」為主，則代表著臺灣已從對大陸的認同轉移到對日本母國的認同。因此不管是清代臺灣八景或是日治時期臺灣新八景都連貫著一條從本土延伸而來的主軸線，顯現出一種野心，從海岸到山邊，一種包山包海的制約與掌控，代表著制約異己文化的象徵。

S. Schama 在其書 *Landscape and Memory* 寫過：「國家的認同若缺乏其獨特地景滋養，將喪失其絕大的魔力，同時地景可以被繪製、昇華和豐富，視為祖國的魅力。」 ( 1995 : 15 ) 以維多利亞的英國為例，以登山為文本的文學創作，間接幫助英國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登山文學創作中所編織的登山故事，變成專為帝國主義編織的神話，刺激或鼓舞著英國人努力走進世界之中，去探險、去征服、去統治。 ( Hansen, 1995 )

義大利人狄索 ( Desio ) 就是公認是首次成功登上喜馬拉雅山群峰中最險峻的 K2。自然地，他不但成為義大利的英雄，甚至也成為義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的宣傳工具 ( Polezzi, 2003: 34 ) 因此登頂就具有競爭性，各項競爭性其有直接和間接兩面性。直接的競爭，例如：挑戰第一、第一位登頂、第一位女性、第一位單獨登頂，第一位冬季登頂等等。而間接之競爭則在於挑戰登頂的方式與品質。 ( Donnelly, 1994 ) 1953年紐西蘭養蜂人 Edmund Hillary 和尼泊爾雪巴嚮導 Tenzing Norgay，成為全世界第一位登頂聖母峰成功的人士，一夜之間兩人都成為英雄，一位平凡的農夫，Hillary 受封為英國爵士，直到今天，都享受著尊榮，這也許就是登山的終極回報，對於許多國家而言，包括登頂聖母峰或其它世界各峰成功的實例，就是刺激與鼓舞國家意識的最佳工具。 ( Morin et al., 2001 ) E. Dutton 一位曾經在肯亞殖民政府擔任高職的英國殖民官員，在其著名的著作肯亞山 ( Kenya Mountain )，述及他嘗試登頂

的努力，而他的企圖，不過就是希望登上這個肯亞最高峰，其所統領的殖民土地，在山頂上進行帝國的凝視。這種意義不僅代表男性幻想使命的完成，同時也代表著一種不容侵犯的正當無爭議的殖民力量 ( Myers, 2002 )。

有關於臺灣登山旅遊的記載除了散見在鳥居龍藏 ( 1996 )、森丑之助 ( 2000 ) 的臺灣山地地區探險記載之外，《臺灣登山小史》( 沼井鐵太郎，1997 ) 算是最有系統的。除了不可考的原住民歷史，玉山對於清領時期的漢人而言，僅僅是遙遠的傳說，因為所有關於玉山的文字描述，都只是缺乏實證的飄渺意象而已 ( 戴寶村，2001：126-130 )。爾後雖經過了開山撫蕃階段，但是否有中國人登頂成功，根據日人沼井鐵太郎的說法，卻是查無實據的說法 ( 沼井鐵太郎，1997：16 )。

因此對玉山的探勘，應該是日治以後，在《臺灣登山小史》也詳細登入日人與台籍人士登頂的歷史：明治29年 ( 1896 ) 新高山之測量完成，發現其遠高於富士山，日本明治天皇遂命名為新高山。同年 ( 1896 ) 日人本多林學與齋藤音作登上玉山，但僅登上東峰。其後，明治31年 ( 1898 ) 12月德國人史坦貝爾 ( Stoppel ) 成為首登新高山的外國人，但未登主峰，也只達東峰 ( 楊宗惠，1996 )。翌年 ( 1899 ) 有日人熊谷直亮、齋藤讓同樣也只登上東峰。直到明治33年 ( 1900 ) 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 ( 森丙牛生 )，同伴登上主峰，完成首次登頂。戴寶村在「玉山地景與臺灣認同的發展」一書提道，歷任臺灣總督如：13任石塚英藏與16任總督中川健藏二人皆登上新高山，總督登上全台最高峰，當然也象徵著日本帝國對臺灣有絕對的權力，其有「征服」的意義 ( 戴寶村，2001：132-133 )。甚至在日本小學國語課文中，新高山也被納入課文當中，藉以「涵養國民精神」。高山山頂放置神祠不僅有教化的功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對於高山山頂敬神崇聖的觀念更加提倡，如臺灣山岳會常務理事出口一重便說過：「我臺灣山岳會會員應心懷登山報國之信念努力精進，在皇軍進軍之際將同一步調，登山之際不忘以皇民意識為行動基準，到達登山目的地之後，要先對皇居遙拜，歡呼聖壽萬歲，齊唱國歌，祈求皇軍將士武運長久，對護國英靈感謝默禱，進行登高山之際，一路唱著愛國進行曲及本會選定的山之歌，使得皇民意識得以昂揚，士氣獲得鼓舞。」 ( 引自吳永華，2001：133 )。而此類歌頌新高山的歌曲，如藤村作填詞的「新高山」歌詞中：「聳立的神山在遠島之中永遠以尊貴的姿態站立著；明治天皇為之取名『新高山』，島人有誰會忘記呢？背負新高山之名是多麼令人戒慎恐懼的呢！」 ( 戴寶村，2001：136 )，這又是何等的帝國之眼睥睨姿態。

## 肆、帝國地景的複製：山嶺的命名 ( naming ) 與擁有 ( claiming )

登山團隊冒險登頂，其實潛在其背後的最大因素。歷史上，就是對山峰之命名，與其擁有權。換言之，世界上諸多山岳，似乎就是等著人們去發現後再加以命名與聲稱其擁有權的。就如同加拿大的最高峰羅根峰 ( Mount Logan ) 是全加拿大最富盛名的山峰，而在2000年時加拿大總理Jean Chrétien 曾經企圖以加拿大七十年代著名的總理杜魯道 ( Trudeau ) 命名，就

是企圖以一位真實的加拿大名人來命名他們心目中崇高的山岳，也不是沿用開拓時期的舊名（Erickson, 2002: 67）。

而這種象徵最能具有代表性的是臺灣新高山所顯示的意義，原名玉山的新高山，被日本天皇命名為新高山，一層是代表日本國土的延伸，另一層則代表國家權力的支配，如A. Berque（篠田勝英譯，1990：20）所言其命名的動機是：「像這樣的動機可以稱為：『依視線的支配』吧！事實上面向風景的視線，基本上是依據看的人意志左右的主權發動的行為，隨著連想作用，視線對於某環境多少明示性，甚至到達對此環境地域主權的象徵化，這是不用驚訝的。在古代的日本，所謂『國見』的儀式中被表現的，正是這個動機。『國見』是公開的儀式，在此進行中，天皇立於山頂，視線環視四方。像這樣表明對國家的主權。」其中「國見」就是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國凝視。

以新高山而言，日本人透過了測量、勘查、繪圖、命名、立碑、立祠、全民登山、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之設立，臺灣新八景中別格地位的確定，何嘗不是一步步，一個階段接一個階段的描繪過程，不啻說明著日本殖民步步為營帝國地景的複製政策。根據沼井鐵太郎考證，日本總督府始政以來就致力於原住民治理事業，冒險地在山岳地區進行土地測量、自然科學與產業調查（沼井鐵太郎，1997：19）。首先明治29年（1896）新高山測量開始，發現其高於富士山。明治30年（1897）地圖印製完成，明治天皇更名為新高山。明治37年（1904）臨時土地調查局技手高木喜與四登山測量，並發行二萬分之一堡圖。另外明治39年（1906），川上瀧彌與森丑之助再度登上新高山，值得注意的是森丑之助在這次登頂過程中，在新高山頂峰設立了一個神社（同前註，24-26）。在新高山頂建立神社，代表著臺灣自然山岳景觀原始神秘的面紗被揭開，靈峰（日人對新高山之尊稱）頂上的日本神社對山頂的占領，自然也具有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ing）臺灣的殖民意涵，也代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現代化「框架」臺灣的意涵。

日本殖民政府召集藝術家（如：水彩畫家丸山晚霞、攝影家岡田紅陽）針對著新高山繪製作品，特別是岡田的一幅「主山頂上」的作品，主題是新高山的神社，更是充分表現出帝國主義「馴化」的力量（宋南萱，2000：79）。更有甚者是透過這些名家（如：木下靜涯運用渲染強調新高山的高聳氣勢）所繪製的繪葉書（風景明信片），更是將新高山的形象廣為宣傳。

尤其是臺灣登山會的成員與參與描繪臺灣新八景的藝術家們如石川欽一郎、鄉原谷統等，都是評選臺灣新八景中有關山岳部分的重要成員（宋南萱，2000：53）。如此看來，不管是臺灣新八景的選拔以及對新高山的崇拜其實是有跡可循的，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也恍如是取法法國統治阿爾吉利亞的方式，最後的目標是在使殖民地徹底同化於殖民母國。而這種說法也在國內的臺灣歷史論述中，得到相同的呼應（王育德，1993：114）。

## 伍、臺灣山岳與國土認同

從1920年初開始，臺灣的新聞媒體與殖民政府正合作開展了將山野空間殖民化的策劃。

兩者共同建構臺灣高山的想像空間，在兩者推波助瀾之下，登山運動與臺灣國立公園的策劃也正蓬勃發展（陳傳興，1997：64）。而其中國立公園成立，雖然是呼應以提倡觀光，強調國民保健觀念，宣揚殖民政府的愛護自然景觀政策有關，但是重要的是更具殖民色彩的國民精神振興。日人在新高阿里山成立國家公園的意旨中就說明：「國家公園為一國代表的傑出風景，由於接觸者將感受到日常經驗中難得的靈感乃至感激，養成煥發高調愛國蓬勃的大精神」（宋南萱，2000：29）。企盼透過國民旅遊，建立國民與國土間的情感因而產生對國家的認同。大正15年（1926）年臺灣山岳會成立時所揭櫫的設立旨意：

回顧本島，峻嶺雄峰競峙，北由南湖大山，南至大武山，橫亙近百里的中央脊樑山脈，大都保持海拔一萬尺的分水嶺。新高次高（按：玉山與雪山）兩大山巒堂堂相對峙，其景冠於天下。據估計，高度一萬尺以上者四十八座，八千尺上者百餘座，而且大多數仍為封閉的狀況中，如果加上一日行程可來回的峰巒，其數無計，臺灣實為上天恩惠的山岳之國。而且這些山巒莊嚴偉大，並配有質樸勇敢的原住民，環境便自然地接受了原始文化的薰陶，由熱帶至寒帶，大自然的景觀變化無窮，陸續在眼前展開，是他地無法趕及的獨有原色，登山者亦能感受到比別處山岳無法感受的自然變化。接受山岳靈氣的洗滌實為轉換身心的最好方法（引自林孜君，2003：203）。

臺灣山岳會並發行《臺灣山岳》以及登山界與新聞界（特別是臺灣日日新報）的密切配合，都擴大其影響面，正式宣告臺灣登山運動已經從個人冒險探勘，進入集體行動的階段。而1935-1936年之間更是啟開臺灣登山史的新歷程，臺灣已經進入大眾登山的時代，代表是當時臺灣布爾喬維亞階級年輕人的運動。以昭和12年8月7日至11日<sup>4</sup>，臺灣新民報<sup>5</sup>董事楊肇嘉和報社同仁所參加之登新高山之旅為例。參加旅遊的成員大部分是臺灣新民報社同仁，身分雖是「記者」，實際上並沒有幾個是真正的記者，而是負責編輯、管理和行銷的高級職員。其餘的成員有學生、辯護士、醫生、製藥業等各種行業人士，涵蓋了當時臺灣殖民地社會最具現代性、帶有菁英色彩的領域（陳傳興，1997：70）。

當時臺灣布爾喬維亞階級年輕人，紛紛參與殖民統治者透過官方媒體鼓吹的集體登山運動，享受著登頂鳥瞰著理想帝國景觀的樂趣。正如R. H. Schein討論十九世紀美國都市景觀與現代性的關聯時所說過：「鳥瞰著景觀的讀者，雖然是地景的觀察者，然而此景觀的空間次序卻有如權力的脈管般支配著觀察者，因此十九世紀末的地景讀者們是主動也同樣是被動」（Schein, 1992: 19）。

但當時臺灣年輕階級的登山客是否因為鳥瞰著理想帝國景觀就改變其原先的觀念與堅持？確實是值得進一步的觀察。在陳傳興針對楊肇嘉的研究中，指出楊肇嘉耗費極大心力促成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竟然在其參與新高山登頂之後宣告解散，如其言：「登新高山之旅」對楊肇嘉而言，他顯然不會只是一個觀光之旅，它匯集了如此多的「最後」與「不再」、「不在」（陳傳興，1997：68），僅此一端即令人留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sup>4</sup> 時間的推斷有昭和9年與12年之疑（陳傳興，1997：67）。

<sup>5</sup> 台灣新民報日銷5萬份，是足以與台灣日日新報相抗衡，代表被殖民者的民間喉舌。

## 陸、臺灣登山歷史的論述

光復之前，臺灣的登山運動蓬勃發展，歷史之記載資料也周全，如散見在鳥居龍藏（1996）、森丑之助（2000）的臺灣山地地區探險記載之外，《臺灣登山小史》（沼井鐵太郎，1997）算是最有系統的。近年有林攻君（2003）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的研究中，根據眾多史料之記載，詳細記載當時不論是個人抑或是團體登山的歷史記錄，泰半是資料的描述，較缺乏深入的剖析與洞見。惟《臺灣山岳》第五號會刊（1929；楊南郡譯，2000）中仔細描述台北一中（即現建國中學）的新沼佐助等一行人由太魯閣進入並經托博閣登上奇萊北峰，由合歡山而下，登合歡三峰，經合歡瀑布、托洛庫而出霧社，是一次創記錄的學生業餘登山運動。若按照羅蘭·巴特的說法這是一種源於歐洲布爾喬維亞階級的喜好，透過呼吸潔淨空氣、凝視山巔、攀登峻嶺等身體動作而生成再生感覺培養對自然與純淨主義的崇拜（Barthes, 2000: 74），而此種青年學子的登山運動似乎也引燃日後臺灣青年登山運動的先聲。但是光復之後，由於當時生活條件與政治條件比起日治時期較差，登山人口銳減至數十人至多不超過百人，而且大部分是商人，學生較少（林麗雲，2004：108-109）。但是隨後由於經濟起飛，政府推動「無煙囱工業」的觀光事業。同時，民國四十九年中部橫貫公路開通，交通便捷與登山管制較鬆，登山人數逐漸回復昔日榮景（譚靜梅，1996）。特別是民國五至七年間也是臺灣登山活動之顛峰，如黃俊騰（1994）的研究指出青年參與活動人數增加十倍，特別是由青年救國團所主辦的類似德國「流鳥」運動的高山健行、攀岩活動都是年輕人所追求。光復之後，救國團在臺灣各處山區興建山莊，由於這些救國團建築在地緣上有相當濃厚的政治意涵。救國團雖為「民間團體」，但事實上是結合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組織，在社會上建立了一層嚴密控制的基礎。而興建在各處的山莊就形成其社會控制的據點，當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就是表示更多的將來社會精英志願接受其支配。救國團沿著北、中、南三條橫貫公路的路途上興建青年山莊，如：洛韶、天池、梅山、天祥山莊等都位於國家公園內登山路線上，救國團對不同山莊或地點的命名權，而山莊的土地雖不屬於救國團的財產，但卻擁有使用權，因此臺灣在五至七年代之間救國團的種種作為，也算是帝國地景複製命名與擁有的樣本。而有關這段期間內發生的歷史記載，特別是救國團以半官方姿態之介入，對於登山活動之影響從象徵與想像的層次可以深入詮釋。

當然若不談政治的想像，有人認為登山只是逃脫現實社會的桎梏（張蕙芳，1999），就像德國青年運動「流鳥」運動，代表著對於父母、學校、教會等所支配傳統社會的反制。為了逃離傳統的布爾喬維亞社會，他們結伴而行主動地親近自然景觀，也代表著從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脫逃的意義，因此有人認為登山也可以視為對上流社會的反制（Kiewa, 2002），就像德國流鳥運動是一種反制社會的隱喻（metaphor of resistance）。但是在現在的登山運動，都潛藏著一些矛盾與衝突，這都是真實與偽造，純淨與腐化之間的矛盾（Myers, 2002）。隨著幾次山難發生，年輕人逸樂取向之移轉，休閒多樣化，分散年輕人參與的機會，政府或學校為了避免麻煩起見，並不特別鼓勵青年學子，讓登山活動缺乏了新血的加入，致使此項登山運動又逐漸式微。2002年聯合國宣布為「國際山岳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Mountains）開始，國內各界也開始興起行銷臺灣山岳的風潮（郭瓊瑩，2002），由林務局與國家公園等單位所倡導的多項措施，不啻在喚醒國人親山、樂山的風潮。由於國民所得之

日益提升，及週休二之實施，使得國民的休閒時間增加，國人對於戶外遊憩活動之需求亦相對提高。近年來登山活動在國內蔚為風氣，在週休二日之後，前往郊外踏青，更成為多數人在假日所選擇的休閒活動。

## 柒、布農族遷移與臺灣古道系統

遷徙是動物界中包含人類的很多動物經常發生的行為，遷徙因此是人類常有的行為。在流動的社會意義中，學者們常常討論的遷徙是永久性移動，因此不同於各種其他類型的人類移動，包括游牧、勞動力的季節性移動、長距離的工作旅程及旅遊等。也有強迫性遷徙，如放逐、流離等。強迫性遷徙是國家或社會機構行使權力造成的遷徙，最嚴酷的形式是放逐和販奴（Urry, 2006）。

遷徙，也是布農族文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行為，布農族原始遷徙關乎其生命的延續、與自然的互動關係、與異族的共生模式。若要探究布農族遷徙路徑，必須先瞭解布農族在臺灣之最早居住地，從歷史縱深陳述布農族歷次重大遷徙，最後討論影響布農族遷徙之原因：布農族神話傳說、禁忌與夢兆對於遷徙之影響（Danapima Lumaf, 2008）。布農族的原始遷徙乃因原定居地食物供給減少、資源枯竭和人口過剩等因素使然。近代的遷徙，絕大多數屬於國家權力行使所造成的強迫性遷徙，如日治時期實施「集團移住」政策，日人強迫生活山區的布農族遷移至近平地之丘陵地，一來便於管理控制，二來布農族遷出的地區便於重新進行林產、礦產、水利的開發（林澤富，1999）。現代的遷徙，則主要是為了工作機會向城市之遷徙。

臺灣高山地區的古道系統之存在，源自原住民因生活遷移自然走出的「步道」，爾後漢人與日人介入，利用官方公權力正式開闢的清代「撫蕃」、日治「理蕃」的道路系統。其系統包括：清領時期的「關門古道」從今日的集集到花蓮瑞穗，「水沙連古道」從集集到埔里等。日治時期包括：「中の線警備道」即「關門古道」加上「八通關日據越嶺道」；「萬大、卡社警備道」是中央山脈唯一的縱貫古道；「人倫警備道」（鄭安晞，2000）。

主要生活在中央山脈之中的布農族（Bunun），正確的說法應是Taimidadaq tu Bunun（這塊土地上的人），原本是固守著土地的布農族卻是不斷遷徙的民族。16世紀布農族生活在現在的西部平原，約於17世紀中後期，族人開始向東部及南部移動，其中經過日治、國府期間。布農族遷移的古道路徑系統，較廣泛被討論者，通稱「八通關日據越嶺道」（以下簡稱八通關越嶺道）。

八通關越道直線測量全長115公里，西段自南投縣東埔村，東段自花蓮縣玉里卓麓村；西段自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起迄點經樂樂、八通關至大水窟長33公里40公尺，東段自花蓮縣玉里鎮經卓麓、山風、黃麻、瓦拉米、山陰、托馬斯、米亞桑至大水窟，長82公里145公尺，日人修築及闢築之越嶺道與清朝吳光亮基於軍事動機修築慣稱「八通關古道」，基本上概略路線相同，但路徑上完全不同而且幾乎完全沒有重疊之處。然因鮮有人跡，絕大部分已湮沒荒草之中。竣工於1921年的八通關越嶺道東段，其路寬約1.2至1.8公尺不等，海拔高度從花

蓮卓溪鄉南安村約150公尺攀升到3300公尺，地形崎嶇險峻，蜿蜒在的拉庫拉庫溪南、北兩岸，路經各主要布農族巒社群及郡社群聚落。

日人在此路徑上建置駐在所等，以遂行所謂「理蕃政策」，並開始施行集團移住政策，造成大量布農族在極短時間內的遷移入日人建制的移民村，也造成布農族內部社會組織瓦解、信心頓失、文化價值觀受到極大衝擊等，族人也必須提早接觸現代化生活與危機。接下來的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聲稱其為便於管理之故，延續日人之移住政策，繼續對高山地區原住民進行移住政策，但方法上溫和許多，布農族在此時亦有部分部落移住。

年幼時，阿公會告訴我，在日人殖民時代，由於日人不諳布農族人語言，與族人溝通產生障礙，易有衝突，族人為了和平及便於與日人溝通，同意日人使用自己的語言，所以過去日人把布農族人所居住部落地域用日本的音譯，化為文字形諸書面資料，如今，日人離開了，布農人被外來政權「移住」了，屬於布農人自己的地域名稱，隨著記憶而變形，布農後裔現已無法正確道出先祖居住的部落地名。（Danapima Lumaf, 2008）

政府必須給布農族人充分恢復舊社地名權利，在規劃原住民相關議題時要絕對的尊重及讓族人充分參與討論。筆者認為布農族人有責任找回前族人曾經居住的舊社地域名稱，好讓當代族人重新找回與祖先交融的共同文化，回復與山林的良性互動及對話。這樣的恢復舊地名權利若不予尊重，就等於阻斷了原住民族延續傳統文化與山林智慧的生存權利。「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其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的尊嚴和多樣性。教育和新聞應適當體現出這些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這是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15條1項的呼籲，給予原住民族追溯其整體文化之變遷脈絡，並依其意願將傳統領域正名化。「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當然會遵照祖先的生活智慧保護我們的山，保護我們的土地，為什麼政府總是沿用日人的音譯，而不讓原住民族可以恢復我們的土地舊名呢！」（Danapima Lumaf, 2008）

由林一宏（2004）《八二籽—四五米：八通關越嶺道史話》一書中，看似以布農語發音標示的地名，不少是沿用日文音譯而有與真正布農語殊異的謬誤。例如，八通關越嶺道有些舊名如瓦拉米步道，瓦拉米就是一個錯誤的日人譯音，以訛傳訛現在變成使用的正式名稱，其實在布農文化裡這是錯誤的唸法，類似錯誤的例子不勝枚舉。布農族的歷史，現所為人知的，是以口述方式代代流傳，是母親在入睡時對孩子述說的床前故事，也是父親表彰自己功勳彪炳的戰爭故事，又是老祖母講給孫子聽的神話故事。錯誤的音譯將使布農族的口述文化產生傳承的危機。筆者以為必須將布農族在八通關越嶺道地域中的舊地名以布農語發音及註記，冀能喚醒布農族人對自我的認同，解開布農傳統與現代社會的矛盾，以期在未來族群文化語言與居住地域的融合中，能有延續性的傳承。

未經翔實考證的史料可能將造成歷史詮釋的偏差，嚴重傷害歷史真相的再現，甚至是侵犯集體族群的人權，史學界豈能不慎於史料之考證工作？綜觀其林一宏書中至少存在著以下的謬誤：

1. 八通關越嶺道開發前、後時期之比較，布農族原有部落的形成及日人「理蕃」政策的改變下日本政府如何改變布農族的社會生活。
2. 八通關越嶺道前、後時期，正確之布農族原地域名稱的地理圖示。

3. 對布農族傳統建築空間及居住空間意涵的詮釋。
4. 八通關越嶺道沿線原有布農族舊社地域名稱及正名化
5. 布農族遷徙路徑的正確詮釋。
6. 未完整地建構歷史資料，呈現布農族歷史的主體性。
7. 未釐清族群衝突原因。

## 捌、框架臺灣 ( Enframing Taiwan ) 的解讀

在Timothy Mitchell( 1991 )《殖民埃及》( *Colonizing Egypt* )一書中的「框架」( Enframing )專章的論述，Mitchell 討論了殖民政府如何利用分區 ( regimentation )、幾何 ( geometry )、個體化 ( individualization )，簡言之「框架」就是一種區隔 ( devide ) 與包含 ( contain )，如建築堡壘區隔異族，再將欲統治的人限制在特殊領域 ( Myers, 1998: 2 )。如同傅科 ( Foucault ) 式的泛視系統 ( panopticon )，他將埃及的殖民社會解釋成是西方世界以理性的空間與時間觀念駕馭東方世界，並引用傅科對於泛視系統的分析，說明如何利用西方的理性化、個體化、孤立化殖民地子民。以便於殖民與統治埃及。讓他們從隱晦難明 ( invisible ) 變成清楚易見 ( visible )，而讓國家機器輕易地支配。而Mitchell的觀念是認為殖民統治者利用有效的空間管制使其人民個體化，因而使其完全地暴露在監視的凝視中。除了Mitchell、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 )中也有類似觀點，如提到「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三者有形塑殖民地的想像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Anderson, 1999 )。

G. A. Myers ( 1998; 2002 ) 也利用Mitchell的「框架」理論，說明非洲的「後探索時代」( post-expolration ) 殖民地理，可視為審視非洲的新史觀。一次與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非洲肯亞的英國殖民政府將肯亞景觀原本毫無秩序的架構，改變成區劃的地區。在報告中、在地圖上，白人殖民者與非洲被殖民者重新仔細地區劃過，肯亞的土地依殖民者的想像重新配置，原本生活在這土地之上的肯亞人民也正式地被異化，他們的故土遂變成白人的高原 ( Myers, 2002: 26 )。

故Mitchell的觀念是相當具有建設性的論述，正可以引用於解釋1895-1945年日本統治下的殖民臺灣。明治卅一年 ( 1898 )，兒玉源太郎出任臺灣第四任總督，他任命留德的醫學博士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生物學政治，認為殖民政治就是一種生物學的政治。利用調查、統計的方法以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並在此觀念下展開了政治、經濟、社會、人口、自然資源的各種調查工作 ( 溫振華1985 : 72-74 )。這與傅科 ( Foucault ) 所提出的「生物政治」( bio-politics ) 觀點 ( Dreyfus & Rabinow, 1982 ) 相近，此二者都試圖對人民的生命做出最詳細、最詳盡的管理及干預。後藤新平以所謂「生物學原則」的精神，嚴謹而詳細的從事整個臺灣的研究與調查：大至整個臺灣地形地貌的調查，小至各式野生動植物的標本採集；從臺灣社會舊慣的研究，到全面的人口普查；從土地地籍的清查，到農村牛隻牛籍的數目及異動等各式各樣巨細靡遺的調查。

日本政府據台之後，首先展開的是土地的調查而非人口的普查。土地的調查，目的不僅是增加對地形地勢的了解，更重要的項目即是對於地籍的清查。矢內原忠雄（2002）在其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中，對於土地調查的功能及價值作如此的描述：

土地調查的效果：一是明白了地理地形，獲得治安上的便利；二是整理隱田，土地的甲數增加，（中略）財政收入增加；三是經濟上的利益，即因確定土地權利關係，土地的交易獲得安全。（中略）土地調查成為臺灣資本主義化、日本資本征服臺灣的必要前提及基礎工程。（p.18）

大量的統計數字及研究資料所為為何？為的是日本殖民政府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的掌握其殖民地的一切資訊，透過這些數字及研究，將原本日本人眼中混亂的臺灣，建構成一個清晰、有條理的知識體系。因此，調查的愈是徹底，也就代表了控制的愈徹底，也就是說，外來的殖民者透過他們自己的方法，一步步的將臺灣分解成他們眼中的臺灣、轉換成他們可理解的臺灣，就如同Mitchell說過的一句話：「殖民權力要求這個國家變得可以翻閱，就像本書一樣。」（Mitchell, 1991: 33）

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做了詳盡的土地調查之後，即是繪製與建構大量的地圖，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繪製的臺灣堡圖，以及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臺灣地形圖（軍部圖）。這些地圖可說是臺灣首次出現精準、詳細的全面性地景描述；殖民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採用科學的方法，詳實的紀錄下臺灣的地貌，許多地圖至今仍有極高的準確性，且當時作三角測量所訂下的樁位，至今仍是臺灣三角定位的基準。這些地圖如此廣泛又如此的精準，也就是說當地圖繪製完成後，整個臺灣即赤裸裸地、一清二楚地呈現在殖民者眼前，一如Mitchell觀察到的。殖民地地圖的完成，在某個層面而言，正代表了殖民權力的確立以及殖民知識體系的建立（姚人多，2001：152）。以下的說明可以作為殖民政府輿圖建構的最佳理由及註腳：

當我在土地調查局翻閱各種不同的地圖及土地帳冊，（中略）這個島上的每一個城鎮，每一個村落，其確實位置都已經被掌握，每一個田地及農場，不管它們再怎麼小，我們也有它的面積等等的正確資料。當我們來到放置土地帳冊的房間時，後藤伯爵要求其中的一個官員向我展示某一個村落的地圖，該名官員看了看索引，隨即迅速地找到一張地圖在我們面前攤了開來，（中略）在這張地圖中，我們看到了稻田、茶園、小溪、山丘、森林，它們都是經過三角測量後精確地被畫上。（中略）只要有一隻鉛筆及一張像這樣的地圖，我們便可以輕易地計算出臺灣的地形及地勢，就像是我們在看自己的手心一樣簡單。（摘自姚人多2001：153-154）

以上這些對話與上述Mitchell的講法是有異曲同工之趣。以日治時期臺灣的玉山調查為例：包括森丑之助的多次調查，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強力推動的「理蕃事業」，總督技師野呂寧的地形測量、「蕃情」調查，八通關越嶺道的完工等。日人對於玉山的地形、地質、動植物、原住民的情況已經相當清楚，比起清代對玉山的認知大相逕庭（戴寶村，2001：131）。

將各個方向的訊息整合在一起，我們將會發現臺灣在日治的五十年間所進行的，是一種主體缺席的殖民現代性（夏鑄九，2000：65）。在整個現代性的建構中，臺灣人民的主體性

是缺席的，有的只是日本殖民政府單方面的主體建構，不論是臺灣的社會文化或是臺灣的風景地貌，都被殖民政府以一種「刮去重寫」的方式，重新以殖民者的角度再詮釋與再建構。尤有甚者，殖民者所建構起的認知與知識，透過各種規訓的方法，反過來成了被殖民者（臺灣人）用以看待臺灣社會的方式。然而其背後隱藏的種種意涵，若依傅科的觀點看來，所代表的正是一種規訓的力量，統治的殖民政府就是利用種種框架，來讓殖民地變成一個淺顯易讀的文本，不但統治者可以恍若翻閱地圖般輕鬆愉快解讀，更甚者是，被殖民者只能依循殖民者的旨意閱讀，而這正是滿足殖民者的統治企圖。而這些工作的具體表現的結果，展現出來確實是現代化的成就，是一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成果。讓被殖民者，特別是菁英份子特別的心儀，遂造成如後殖民主義論者自我與異己的矛盾，因而產生認同的紛擾。

## 玖、登山導遊地圖與手冊（Guide）

一般沒有經驗的山友，企圖征服難以克服的高山，除了個人必須的體能與技能之外，尚依賴有經驗的高山嚮導以及一些編製精確，豐富的登山地圖與手冊。

在對登山歷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某些國家，如上述的德國就利用其Baedeker Guide中灌輸了國家沙文主義，而當納粹掌權之後，德國政府透過這些登山手冊，把國家主義的觀念灌輸入觀光的潛力當中，而當二戰當中，德國政府更是把其新併吞的疆域，編入其新版的旅遊指南之中（Koshar, 1998）。羅蘭·巴特指出在西班牙佛朗哥政府時代所頒行的旅行書《藍色指南》<sup>6</sup>中充滿著許多謬誤與偏頗，他認為旅行指南是作為欣賞觀光或旅遊教育中首要的工具，藉此得到視野與文化的認知。但是他也指出旅行指南扮演著「盲目代理人」（a agent of blindness）的角色，不僅限制了旅行者的視野，有時強勢運作甚或是遮蓋了文化歷史與生活的真正面象。而佛朗明哥政權的《藍色指南》正是這樣的旅行指南。在此書中它所介紹的景點，都是具有特殊目的的景點，特別是為了彰顯基督教文明，而抹殺了西班牙曾經有過的伊斯蘭教的歷史與文明。遊客們輕易看到基督教教堂，卻難得見到宏偉的回教寺院。同時此書中也刻意地製造了生活在西班牙不同地域中人種的刻板印象，如巴斯克人（Basque）就是冒險的水手，卡達蘭人（Catalan）就是聰明的生意人（Barthes, 2000）。而在介紹臺灣的高山型國家公園內幾條古道系統的專書中，同樣也會出現有如《藍色指南》般的謬誤與偏見。深究其原因，就在於所有作者接受委託之後，並未真正思考山嶽古徑在臺灣的本體性價值與意義，直接就引用日人在治理期間所建構而成清晰、有條理的知識體系。這些包括詳細照片、文字、圖畫紀錄的文獻資料，深得這群臺灣知識份子的心儀，卻也使他們就範於日人的論述框架。因此他們的研究，就像羅蘭·巴特所說的「盲目的代理人」的工作，其內容來若不深究，極可能變成代表日本殖民者的規訓力量而令人反感。舉例而言，由李瑞宗（2000）著述的雪霸國家公園《北坑溪古道》一書中，所引用的照片、文字、名稱、地圖、都是日文的第一手資料，當作者沾沾自喜地進行論述的過程中，不知可否想過對手冊使用者所可能造成的

<sup>6</sup> 此書原名為Hachette World Guides，法文名稱Guide Bleu。

思想衝擊。特別是書中所載明的日警駐在所、砲台等實質空間，都是曾經對長居此處泰雅原住民造成極大的傷害，而真正紀錄泰雅族原住民歷史文化的史料卻不見有大量的引用，自然會引起當地原住民極大的反感。而這本《北坑溪古道》書中的雪見遊憩區在對外開放之初，就造成了雪霸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之間的緊張關係。

猶記筆者曾在2005年陪伴日籍國家公園顧問參觀北坑溪古道<sup>7</sup>，他們對沿途中所出現的雪見駐在所特別深感興趣，執意前往參觀只是當時因為土石流路斷而未能成行。我們都知道「雪見」的日文意涵，難怪日本人會提起這麼高的興致。但是，相同的，泰雅原住民對於「雪見」字眼的反感就更應該深思。

雪見遊憩區規畫之初取名雪見，是依日治時期駐在所命名，過去日人因當地可遠眺大、小雪山景致而得此名。當地泰雅族人認為雪見一帶是泰安鄉泰雅原住民傳統獵場，該地有高山地區難得的湖泊水源，因此吸引大批野生動物聚集，特別是山羌大量群聚於此，泰雅語稱「bwanpara」，意指守候山羌出沒的地方。雪見過去是部落爭逐的最佳獵場，附近的幾個部落會以狩獵、捕魚比賽一較高下，勝出者獲得狩獵權。目前雪見遊憩區管理站所在的位置，是進入獵場的門戶所在，過去婦女老幼會在這裡吹奏口簧琴、唱歌祈福，目送勇士出獵，泰雅稱此地為「tlbugan」，意即「吹哨、歌唱之地」，因此這裡對泰雅族人別具意義，是一個集祝福、別離和守候的溫馨之地。數百年來，這裡流傳了很多感人、有趣的故事。「雪見駐在所」是日本人「理蕃」政策的產物，如果沿用日人名稱，反而忘記了當地原住民的歷史，十分可惜。雖然當地泰雅族人有正名的要求，雪管處處長林青處長在聽取泰雅族人心聲之後表示，雪管處將秉持尊重當地文化的精神予以配合。但雪見遊憩區規畫十餘年，立即正名有行政作業上的困難，目前可以做的是在現有的標示上，增加泰雅地名標示，並且增設原住民歷史故事解說。日後雪管處將逐步為雪見正名，讓此處成為生態保育之外，也富涵文化意境的國家公園遊憩區。（中國時報，2007/01/07）

同一位作者對於其它國家公園的相關著作中，如太魯閣國家公園出版的《蘇花道今昔》（李瑞宗，2003）一書，大體上還是順承日人遺留下的文獻史料作為論述的根據，大凡仍依清代政府或日本政府的角度與觀點來論證，舉例而言，書中介紹武塔部落中的「莎鷺之鐘」故事，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李瑞宗，2003：193-194）事實上，歷史學者周婉窈（2002）曾經有過詳細的描寫，基本上這段過度誇大的故事就是日本政府想要消弭1930年霧社事件所引起與泰雅族的緊張關係。有關這點作者不知是不察或有意帶過。而另一學者林正芳（1995）也提出1993年NHK電視台還將此事解釋為臺灣原住民對日本還存在的情結，這種錯誤的報導是相當離奇怪誕，似乎也可以解釋即使直到今日日人尚存在錯誤的想像，作者在為史作論時的疏忽可見一般。

另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另一介紹山徑的書《山徑百年》（黃文卿，2000），則除了少數的日本資料之中，開闢中橫公路的珍貴史料照片則成為此書中的主角，讓讀者親炙歷史的脈動，是否才是一本旅行指南應有的雅量與包容。除此之外，上述林一宏（2004）《八二籽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史話》一書也是有著「盲目代理人」的指南謬誤。作為一個國家公園的解說代表作，在此土地上所呈現過的種種歷史痕跡，原住民、日本人、臺灣人、中國人，

<sup>7</sup> 2005年10月29日筆者帶領清泊素子教授與宮地信良先生共同會勘雪霸國家公園尚未開放的雪見遊憩區。

都應該給予一定的地位與視野，不容偏廢，但也不能過分偏頗。日本人治領期間，所整理過的大量史料，在國府戒嚴時期，是受到一定的擠壓，但是解嚴之後，這些資料也不能當做唯一的史觀來逕行臺灣登山路徑的詮釋權。單就「八通關日據越嶺道」這一方面的Danapima Lumaf (江冠榮, 2008) 的論文〈臺灣雲端上消失的獵人——再現布農族於八通關聚落原貌與遷移歷程〉特別以布農族於原住民的觀點，提出糾正自然就值得期待。如林文中對1933年卓樂(卓麓)大屠殺之發生時間起疑，認為並未發生(林一宏, 2004: 35)。但是Danapima Lumaf文中卻以其祖父與表叔公的親身經歷，說明當時卓樂村巒社群與郡社群的布農族一百餘人慘遭殺戮(Danapima Lumaf, 2008: 60-61)，這種歷史公案在林文的討論輕輕略過，卻以極大篇幅報導日警犧牲的史蹟。對於無文字記載能力，只能以口語相傳的布農族實是極端不平衡的報導。

## 拾、結論

吾輩臺灣人有幸生於上天恩惠的山岳之國，若不能夠將此天賜自然資源轉換成轉化社會與文化的力量，讓生活在臺灣的人們能夠受此滋潤，轉化心性。而山岳景觀的象徵意義，雖然自然天成，但卻常常遭受有意的扭曲、濫用，這種情形，在國外有之。而臺灣所處的特殊環境，在歷史之使然下，這種情況之發生，當屬可能。關於本研究企盼能對此有所貢獻，揭開臺灣山岳景觀之神秘面紗，還原其真實的面貌，遂將Simmel的說法，從現代社會流動到高山地區，從現代都會的身體流動到高山上登山的身體展開討論。

復又，研究者長期擔任臺灣國家公園環境總顧問，有幸探訪群山，親炙山峰之美。然而也發現諸多問題，都會人士尋山探幽以逃離市塵繁華，而植生於斯的原住民，卻不能擁有山的自主。當然其中潛在的因素甚多，研究者衷心盼望將利用過去與未來的研究，尋出根本解決對策。誠如J.Clifford指出流動的隱喻就是打破實質空間與理論思想的藩籬，流動提供一種工具讓人們彼此間不再隔離，彼此的思想得以互動，流動也可打破空間的藩籬，促成不同文化、政治、社會認同的融合。(Katz & Smith, 1993: 78)。

游牧(nomadic)與靜止(sedentary)的辨證關係似乎可以成為流動討論的主軸，所不同的是在討論流動的類型，而每一種流動類型的討論中都可以是多種意義，但是高山僻野流動類型的討論可以成為本文的焦點？李瑞宗(2008)的另一新作《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中介紹台北市裡的植物園，其書內依然還是大量引用日本照片史料說明，這些既往陳跡是否值得如此大書特書自然有待公評，值得注意的是跟你我的關係如何。這些陳跡只是告訴我們歷史上台北植物園是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展示其殖民地成就的場所<sup>8</sup>，不僅如此，討伐泰雅族勝利的「討蕃凱旋祝賀會」在此召開(李瑞宗, 2008: 73)，連紀念與原住民爭戰中陣亡的日警，特別是在沿著日據八通關越嶺道上與布農原住民戰爭中死亡的日

---

<sup>8</sup> 包括大正五年(1916)台北「台灣勸業共進會」，大正十四年(1925)台北「始政三十年博覽會」，都以此地為展覽會場。

警，所設立的建功神社（今教育電台），也曾經是在此植物園中，這對於原住民後代不啻是極大打擊。台北植物園作為一個台北市民的休閒公園，是市民天天在此流動的場所，但是這些日常生活這些作者眼中可能都不及將他們手中所握有的第一手史料著作成書來得重要。描述日本殖民政府的豐功偉業，讓讀者只能依循殖民者的旨意閱讀，而這正是滿足殖民者的統治企圖。這些著作菁英曉不曉得特別心儀殖民者的旨意，所造成如後殖民主義論者自我與異己的矛盾，因而產生認同的紛擾。當然在其創作中將這兩條主軸與常民日常生活交織一起自是可能，但是他們的創作企圖卻看不出來，不知是不能或不想，就不得而知。

殊不知他們所著作的「發現修辭」對照著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15條1項的呼籲：「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其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的尊嚴和多樣性。教育和新聞應適當體現出這些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是相當矛盾的，他們忘記給予原住民族（對整個臺灣而言：包括原住民、新住民，當然中間來的客家、河洛也算）追溯其整體文化之變遷脈絡，並依其意願將傳統領域正名化的權利。

## 參考文獻

- 《中國時報》，（2007年1月7日）。
- 王育德（1993）。《臺灣 苦悶的歷史》。台北：自立晚報。
- 王淑燕等譯（1999）。《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台北：立緒。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2002）。《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海峽。
- 吳永華（2001）。〈臺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51期，頁123-136。
- 吳叡人譯（1999）。Anderson, B. (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
- 宋南萱（2000）。〈臺灣八景：從清朝到日據時期的轉變〉。中壢：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文卿（2000）。《山徑百年》。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 李瑞宗（2003）。《蘇花道今昔》。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 李瑞宗（2000）。《北坑溪古道》。苗栗：雪霸國家公園。
- 李瑞宗（2008）。《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台北：南天。
- Danapima Lumaf, 江冠榮(2008)。〈臺灣雲端上消失的獵人 再現布農族於八通關聚落原貌與遷移歷程〉。中壢：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澤富（1998）。〈日治時期南投地區布農族的集團移住〉。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一宏（2004）。《八二籽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史話》。南投：玉山國家公園。
- 林玟君（2003）。〈日本帝國下的臺灣登山活動〉。台北：臺灣師大體育系博士論文。
- 林正芳（1995）。〈莎韻之鐘的迷思座談會後記〉，《宜蘭文獻雜誌》，12期，頁96-101。
- 林麗雲（2002）。〈山的脈動：臺灣山岳畫與山岳畫家呂基正〉。台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婉窈（2002）。《海行兮的年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 篠田勝英譯（1990）。オギユスタン・ベルワ（A. Berque）著。《日本の風景・西歐の景觀：そしこ造景の時代》。東京：講談社。
- 吳永華譯（1997）。沼井鐵太郎著。《臺灣登山小史》。台北：晨星。
- 夏鑄九（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期，頁47-82。
- 姚人多（2001）。〈認識臺灣：知識、權利與臺灣在台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期，頁119-182。
- 楊南郡譯（2000）。《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台北：遠流。
- 鳥居龍藏（1996）。《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台北：遠流。
- 陳傳興（1997）。〈登新高山紀念片 由楊肇嘉新高山之旅談起〉，《臺灣史料研究》，No.10，頁62-86。

- 楊宗惠譯註 (1996)。〈史脫具 (Stoppel) 之福爾摩沙島內地旅行暨新高山 (摩里斯山) 首次攀登 (1898 聖誕節) 記行〉,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25 期, 頁 141-176。
- 楊南郡譯 (2000)。〈從太魯閣峽口沿古道縱走奇萊北峰、合歡連峰〉, 《山徑百年》, 太魯閣國家公園, 頁 208-217。
- 郭瓊瑩 (2002)。〈從國家步道系統之建立談臺灣山岳遊憩資源發展應有之向度〉, 《第六屆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專文集》, 頁 1-19。
- 戴寶村 (2001)。〈玉山地景與臺灣認同的發展〉, 《國家認同論文集》, 臺灣歷史學會研究專刊 4 號, 頁 123-145。
- 黃俊騰 (1994)。〈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之研究〉。台南: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溫振華 (1985)。〈二十世紀初之台北都市化〉。台北: 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 張蕙芳 (1999)。〈逃離與追尋——登山的社會學研究 (以兩個登山團體為例)〉。台北: 台大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譚靜梅 (1996)。〈光復後臺灣地區登山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為中心〉。桃園: 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系碩士論文。
- 鄭安晞 (2000)。〈丹大地區的人文生態——布農族與古道概說〉, 《第四屆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專文集》, 頁 51-65。
- Barthes, R. (2000). *Mythologies*. London: Vintage.
- Baudelaire, C. (1998). *Le Spleen de Paris*. Paris: Maxi-Livres.
- Bayers, P. L. (2003). *Imperial Ascent, Mountaineering, Masculinity, and Empire*. U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 Blake, K. S. (2005). Mountain Symbolism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Cultural Geographies*, No.12, 527-531.
- Carr, A. (2004). Mountain Places, Cultural Spac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ly Significant Landscape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2(5), pp.432-459.
- Chambers, I. (1990). *Border Dialogues: Journeys in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Davidson, L. (2002). The "Spirit of the Hills": Mountaineering in Northwest Otago, New Zealand, 1882-1940. *Tourism Geographies*, 4(1), 44-61.
-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Donnelly, P. (1994). Take my Word for it: Trust in the Context of Birding and Mountaineer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17(3), 215-241.
- Dreyfus, H. L. & P. Rabinow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Dummitt, C. (2004). Risk on the Rocks: Modernity, Manhood and Mountaineering in Postwar British Columbia. *B C Studies*, 141, Spring, 3-29.
- Endensor, T. (2000). Walking in the British Countryside: Reflexivity, Embodied Practices and Ways to Escape. *Body & Society*, 6(3-4), 81-106.
- Erickson, B. (2002). The Colonial Climbs of Mount Trudeau: Thinking Masculinity through the Homosocial. *Topia*, Spring, issue 9, 67-82.
- Foucault, M. (1979).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lan Lane.
- Glotfelty, C. (1996). Femininity in the Wilderness: Reading Gender in Women's Guides to Backpacking. *Women's Studies*, Vol. 25, 439-456.
- Hansen, P. H. (1995). Albert Smith, the Alpine Club, and the Invention of mountaineering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4, July, 300-324.
- Katz, C. & Smith, N. (1993). Grounding Metaphor. In M.Keith & S.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Koslar, R. (1998). "What ought to be seen": Tourists' Guidebook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Modern Germany and Europ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3), 323-340.
- Kiewa, J. (2002). Traditional Climbing: Metaphor of Resistance or Metanarrative of Oppression. *Leisure Studies* 21(2002), 145-161.

- Loewenstein, G. (1999). Because it is there: the Challenge: of Mountaineering...for Utility Theory. *KYKLOS*, Vol.52, 315-344.
- Lewis, N. (2000) The Climbing Body, N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Body & Society*, 6(3-4), 58-80.
- MacCannell, D. (1999).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McCarthy, J. (2002). A Theory of Place in North American Mountaineering. *Philosophy & Geography*, 5(2), 179-194.
- Michael, M. (2000).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 Mundane Technology, the body and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Body & Society*, 6(3-4), 107-126.
- Mitchell, T. (1991). *Coloniz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tchell, W. J. T.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oranda, S. (2000). Maps, Markers and Bodies: Hikers Constructing the nation in German Forests. *The Nationalism Project*. <http://www.nationalismproject.org/articles/Moranda/moranda.html>
- Myers, G. A. (1998). Intellectual of Empire: Eric Dutton and Hegemony in British Afric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88(1), 1-27.
- Myers, G. A. (2002). Colonial Geography and Masculinity in Eric Dutton's Kenya Mountain.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9(1), 23-38.
- Nettleford, P. A. & E. Stratford (1999). The Production of Climbing Landscapes-as Texts.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37(2), 130-141.
- Porter, D. (1991). *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 Pratt, M. 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olezzi, L. (2003). Imperial Reproduc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Colonial Images across Popular Genres and Medi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Modern Italy*, 8(1), 31-47.
- Reijen, W. van (2001). Breathing the Aura – The Holy, the Sober Breath.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6), 31-50.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s of the Ori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immel, G. (1911/1993). The Alp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6(2), 179-184.
- Schein, R. (1997) The Place of Landscap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merican Scene.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7: 660-680.
- Solnit, R. (2000).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New York: Penguin.
- Tobin, D. (2003). *Mountain Climbing as American Transcendental Pilgrimage; Ralph Waldo Emerson and the Colorado 14ers Peakbaggers*. Edwin Mellen Press.
- Urry, J.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Urry, J.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Urry, J. (2007). *Mobilities*. London: Polity.
- Verstraete, G. & T. Cresswell (eds) (2002). *Mobilizing Place, Placing Mobility: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ethderland: Rodopi.
- Wolschke-Bulmahn, J. (1992), The Fear of the New Landscape: Aspects of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in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Between 1900 and 1933 and its Influence on Landscape Planning.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9(1), 33-47.
- Wood, M. (2001). The Mountain Panorama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Scottish Context. *Cartographica*, 38(1&2), 103-118.

#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Mountaineering in the Taiwanese Alpine National Parks

Chie-Peng Chen<sup>\*,\*\*</sup>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world'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mountains have existed on this earth for more than ten thousand years; however the discussion of spatial discourses relating to alpine landscape has only begun to exist in the recent years.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The Grand Tour had just begun. Nevertheless, during these three hundred years, due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 this type of ancient landscape and traditional mountaineering activity show different symbolic imagin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is research puts points out the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that is shown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unun people and the alpine landscape. However, throughout years, different governments have misinterpreted history. Thu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y “emframe” the Bununs and alpine landscape, and this is shown in this paper. This study uses Taiwan Alpine National Parks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exploring modern mountaineering movement from the angle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personal oral narrations, dairies, autobiographies, and bibliographies of climber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ews help give insight to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Taiwan alpine climbing and hiking routes. Taiwan mountain climbing activity is like a kind of power that expresses how the society interacts with landscapes, especially referring to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gone through different governments and cultural colony in the past.

Key words: mobility, national park, mountaineering, hiking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East Asian Sport Thoughts

---

*Volume 1*

*October 2010*

Executive Editors: Chin-Sung Chiu, Dong-Jhy Hwang

Associate Editors: Chien-Chih Chou, Bo-I Chen

Assistant Editors: Wei-cheng Chiu, Ying Chiang

## Editorial Board

Alan Bairner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Wei-An Ch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hie-Peng Che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Hitoshi Ebishima (Biwako Seikei Sport College)  
Gerald Gems (North Central College)  
Annette Hofmann (Ludwigsbur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hn Horn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Chi-Lin Hsu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ong-Jhy Hwnag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Steven Jackson (University of Otago)  
Grant Jarvi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Patrick W. C. La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ertrud Pfiste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Elizabeth Pike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Wray Vamplew (University of Stirling)  
Mei-Hui You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Reviewers

Alan Bairner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Yi-Tung Cha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zu-Hsuan Che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Wen-Hui Chu (Nanhua University)  
Hitoshi Ebishima (Biwako Seikei Sport College)  
Gerald Gems (North Central College)  
Annette Hofmann (Ludwigsbur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hn Horn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Steven Jackson (University of Otago)  
Grant Jarvi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Patrick W. C. La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ing-Chao Li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ng-Te Li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o-Chin Liu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n-Hung Lu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Yi-Hsiang Pa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Gertrud Pfiste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Elizabeth Pike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Shen Tung (National Kin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ray Vamplew (University of Stirling)  
Chien-Tai Wang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Tsong-Wen Yang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ddress: Taiwan Society of Sport Sociology, 250, Wen Hua 1st Rd., Kueishan, Taoyuan County,  
Taiwan 33301  
Phone: +886 (0)3-328-3201\*8532/\*8305  
E-mail: tonhwang@tsss.org.tw  
General Agency: Hungyeh Publishing Co., Ltd

